

第二章 消費主義與公共事務參與的立論

本文的問題意識為：城鄉白領青年感染消費主義傾向的相異程度，以及兩區域截然不同的生活場域，是否會影響他們對公共事務涉入的態度與行為，以及其涉入的態度、行為深具熱情抑或冷漠、積極抑或消極。一般而言，公共事務涉入的態度、行為具體表現在中國大陸地方基層治理的過程中，此外，本文所界定的涉入亦包含認知國政事務的態度及行為表現。倘若，因感染消費主義傾向的程度差異，造成城鄉白領青年在公共事務涉入的行為迥異，那麼，影響消費主義傾向的重要關鍵—消費主義，其立論如何解釋消費對公共事務涉入參與可能造成的極大影響？而在中國大陸城市與農村的基層選舉中，居民／村民參與的情形為何？伴隨經濟發展而來的消費主義，是否帶來更多公共事務的涉入契機抑或相反？

第一節 消費主義立論 vs. 公共事務參與

一、消費主義的立論

所謂「消費主義」(consumerism)有多種不同解釋，其中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它是一種行為實踐，另有認為其是來自於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教條，²⁰ 但無論是從實踐面或理論面來看，筆者認為，消費主義的概念同時涵括價值觀與生活的實踐。亦即，消費主義透過人類對物質的占有消費，進而讓自身達到滿足的過程，其不但體現出一種生活方式，更顯示消費從無到有的過程中也展現了人類行為的價值體系。通常，消費的目的是為傳統匱乏經濟下的生存所需，但歷經現代化、工業化後的社會，被現代大眾文化所刺激，使人們產生購物欲望上的符號性滿足與消費認同，也同時形塑消費主義的現代性意義。在中國大陸，當城鄉對消費的需要是基於二種不同類型的價值觀、生活方式與生存狀態時，換言之，使用消費

²⁰ 俞海山，「中國消費主義解析」，**社會閱覽** (第2期，2003年)，頁25。

主義的概念作為研究取向，乃是從文化的維度解析中國大陸的社會變遷，並藉以觀察城市與農村的區隔。因此，本文將藉由消費主義立論，嘗試說明其對中國大陸城鄉白領青年在公共事務涉入態度與行為上的影響。

消費主義一詞可進一步詮釋為一種內化人心的生活價值、方式與態度，透過此，消費主義便可被解釋為文化上的意識形態而存在。而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概念是由學者 L. Sklair 所提出，他在其著作《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中認為，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全球化實踐下，文化總是具有服務這個體系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功能，因此可以將消費主義稱為「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態」。²¹ 因此，本文按 Sklair 的想法，將消費主義定義為「一種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方式所影響的社會文化變遷過程，進而，在這個變遷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文化意識形態現象。」本文將從下述三種理論觀點更深入地瞭解消費主義的內涵：

(一)「物質主義」的詮釋 vs. 政治參與的消極有限性

消費主義的興起來自於「物質主義」(Materialism)的出現，物質主義的論調始見於西方在工業革命後，社會向現代化的發展邁進，而經濟的穩定發展與進步也解除人們在前物質主義社會時，對經濟的不安全感與攸關生存上的立即威脅。在經濟持續發展的現代化社會中，當物質主義高漲時，經濟的安全性將使人們追求並擴大生活的物質滿足感，也因此造成文化轉變的現象。²² 在物質主義社會中，對於現下生活的滿意度反映人們無論在積極抑或消極時，如何看待其所處世界的態度。²³ 易言之，身處於現代化的物質主義社會，由於經濟的穩定成長，造成人們對於所處生活圈的安全感之認同，進而放心地追求物質需要與生活當中的各種滿足。

而在工業社會中的物質主義，與前工業社會所存在的前物質主義之最大差

²¹ 陳昕，*救贖與消費：當代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消費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 7-8。

²² Inglehart, Ronald,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1.

²³ Inglehart, 1990, p. 43.

別，則是基於傳統價值的信仰體系之轉變。在前物質主義社會，傳統價值強調的是秩序的維持與存在，以及立即滿足生存的需求，而不去強調經濟的欲望與發展，另外，在前物質的社會中，價值的共享與傳統習慣的維持也在在顯示社會不注重個人價值之追求。相反地，在物質主義社會，其假說是建立在一個人的優先需要是反映其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之中，亦即環境會帶來其主觀價值的展現，包括追求相對短少或是能滿足自身的物品。²⁴ 這也是許多學者對於消費行為的解釋，即某些物品的稀缺性特質造就了人們對其的追求。

Inglehart 曾用六個指標區分物質主義社會的特徵，包括：維持國家的秩序、穩定物價、維持高度經濟成長、確保強大的國防、維持穩定的經濟以及打擊犯罪等。²⁵ 前述指標除反映物質主義者的情感取向指標外，²⁶ 也突顯物質主義的社會是較注重穩定的秩序、物價與經濟等面向。在 Inglehart 的研究中，同時也涵蓋中國大陸社會的價值變化，²⁷ 他認為，中國大陸社會相較於西方社會，有著傾向於更為受到傳統文化所影響的特色，也因此，出現了強調傳統個人價值與現代經濟穩定成長間的「現世理性價值」(Secular-Rational Values)之併存性。²⁸ 圖 2-1 為 Inglehart 針對世界各國的不同經濟區域為基準，區分各國經濟實力的高低與各種文化價值的對應關係，²⁹ 從中可以發現，儘管中國大陸的傳統價值逐漸向現

²⁴ Inglehart, 1990, pp. 54-55.

²⁵ 其研究主題是關於世界價值變化的測量，對象為所有西歐的國家，以及加拿大、美國、墨西哥、澳洲與日本等國，測量時間為 1980-1986 年，其中，Inglehart 將價值類型分為物質主義型、混合物質與後物質主義型以及後物質主義型等，其中混合型又區分為較偏向物質主義與較偏向後物質主義等兩種。在研究結果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價值取向的不同，顯示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職業聲望與收入之差別，在前兩項社會分層取向中，教育與職業聲望較高者傾向於擁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感，而在收入的高低之分析中，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傾向較無明顯差別，顯示人們趨向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的價值並不來自於其收入的多寡。詳見 Inglehart, 1990, pp. 162-176。

²⁶ 後物質主義的指標則有：讓人民對政府決策有更大影響力、保護言論自由、讓人民在工作及社區事務決策中有更多影響力、美化城鄉環境、朝向更重視個人及更人性化的社會、以及朝向依個理想重於金錢的社會等。詳見 Inglehart, 1990, p. 163。

²⁷ 其引用 Edric Ho 對香港及中國進行的調查，範圍包括了香港與鄰近香港的中國的沿海城市，詳見 Inglehart, 1990, pp. 153-157.

²⁸ Inglehart, 1990, p. 155.

²⁹ 該經濟區域的資料是取自於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詳見 Inglehart, Ronald &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7.

世理性的方向移動，但是在社會整體的價值表現上，卻仍然停留在生存價值的取向，顯示中國大陸的大部分人民仍欠缺自我表達的價值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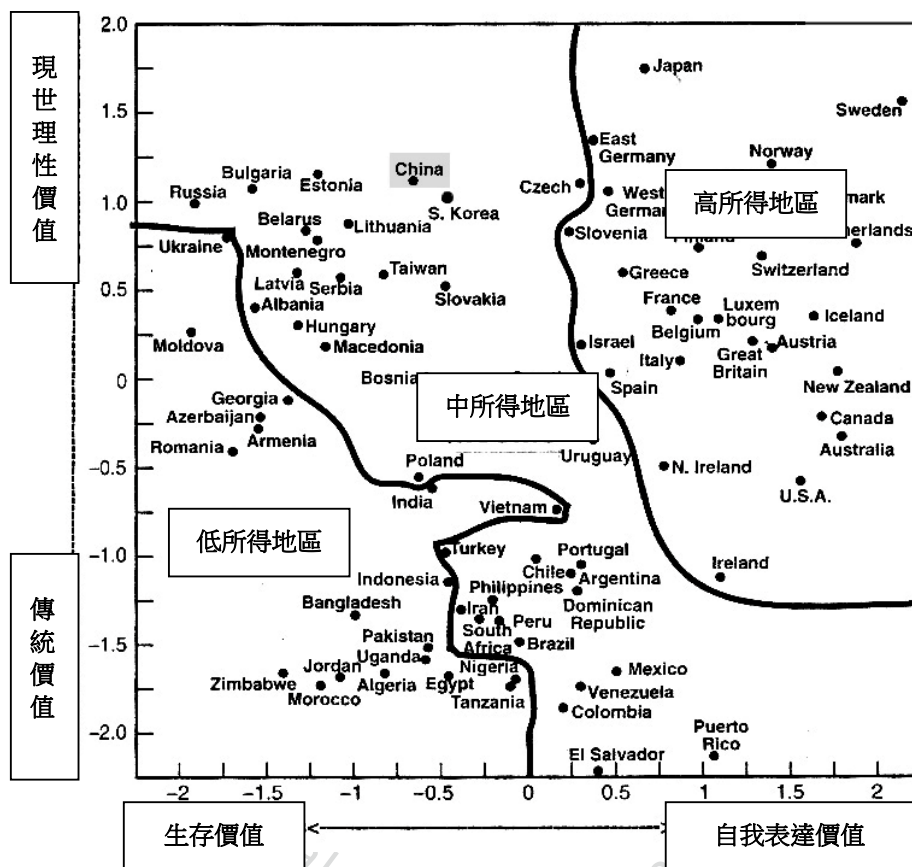


圖 2-1：經濟層次與社會的價值文化分布圖

資料來源：Ronald Inglehart &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7.

另外，Inglehart 的研究也發現，當中國大陸的受訪者在回答有關「是否希望能夠對政府決策具有有更大影響力」的問題時，受訪者傾向認為此種問題「過於敏感」；同理，當詢問受訪者關於「是否希望抑制高漲的價格」時，中國大陸的受訪者也認為此一問題是「不適宜在一個以國家掌握價格的實際情況下」回答。前

述例子說明，中國大陸人民未來仍將持續在尋求個人之滿足與國家/社會群體責任間擺盪的張力。³⁰

在物質主義社會中，經濟的自主性提升並未帶來政治的民主，Inglehart 認為，其原因在於生活在物質主義社會的人民，其僅僅在經濟面向的自我表現能力高，而這是來自於對自我生存及維持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因而，並未像後物質主義般有著「自我表達能力」(self-expression)，以及對權力解放和生活品質追求上的渴望。³¹ 因此，在中國大陸的特殊環境中，傳統的歷史文化遺產加上從未參與過真正的民主之故，社會文化的價值特徵形塑了那群出生、成長在現代化物質主義條件下的中國大陸城市白領青年，並造成其對政治的自我表達能力有限，也不會產生對抗政府的強烈意識。

上述結論也說明 Inglehart 對民主化、物質主義與現代化社會的結論，即工業社會的現代化不必然導致民主，反而是隨著不同的社會發展路徑(伴隨著不同的歷史文化遺產)而動員民眾進入政治；並且，中國大陸的物質主義特徵僅侷限在現代化的城市中，特別是表現在年輕世代身上。此外，對於工業化社會中的現世理性價值展現，也僅僅展現在理性化的官僚組織之操作與維持，而這些官僚的意識形態仍將成為社會中的一種獨斷信仰。³²

Inglehart 所引用關於中國大陸價值轉變之資料，是承自對沿海城市的研究，其範圍並不涵蓋農村，但現今中國大陸多數農村卻也仍未出現如城市般，具備物質主義的現代化工業社會環境。相同的觀點也出現在學者陳昕的論述中，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農村居民生活的總體水平雖已脫離貧困，但吃、穿等消費支出比重仍高達 65% 以上，進入九〇年代後，吃、穿與住等三項支出比重

³⁰ Inglehart, 1990, pp. 156-157.

³¹ 關於前物質主義、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之詮釋，以及三者與現代化、後現代化與工業化、後工業化的交互影響並如何與民主化形成關聯，請參考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77-290; Inglehart, Ronald,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2-77.

³² 見 Inglehart, Ronald & Christian Welzel., 2005, pp. 18-27.

也基本在 80%以上，亦即絕大部份的生活費都用於最基本的需求，顯示農村的基
本生活需要並沒有完全被解決，並且突出地表現在營養、安全飲水、住宅、環境、
醫療衛生和國民教育依然存在著供給匱乏的情形。³³ 因此，綜合中國大陸城鄉
發展的諾大差異，再透過前述「物質主義」與「前物質主義」的相異性加以區隔，
便可將中國大陸的城市與農村地區分別區分為「物質主義」與「前物質主義」兩
種不同的價值取向，進而解釋城市物質主義將不導致民主與政治參與的情形，並
推論出農村在前物質主義的價值條件之下，由於擁有著較城市豐富的社會傳統共
享價值，以及對社會整體秩序和生存的更高需求，導致他們在公共事務涉入的情
形較為熱情且積極。

(二) 炫耀性消費與品味區隔的階級區分觀點³⁴ vs. 公共事務的冷漠疏離

炫耀性消費與品味區隔的觀點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審視，其主要論述集中於個
人消費是如何受群體的影響，例如個體消費可以被視為是受到那些在家庭、社會
階級、次文化團體、種族、生活方式、朋友、職業團體和參考團體中的成員的影
響結果。³⁵ 若從該觀點來看，便能發現個體在消費時會考慮他者的影響力，同
時也會因他者的觀點而促使自身對團體產生欲求與渴望認同的行為。

將別人看待自身的客觀行為、自身進行消費的主觀行為也與 Maslow 所提出
的自我實現需要相關；綜合別人眼中的自我、社會的自我或自己眼中認為別人看
待自我的方式等，都是經學習而達成，且具穩定、持久並有目的性的意義。也因
此，出現了所謂個人主義的獨特意涵，³⁶ 進而，也衍伸出 Veblen 著名的「炫耀

³³ 陳昕，前引書，頁 90-107。

³⁴ 此所指的階級並非古典馬克思主義下，因生產關係不同而形成的階級關係，也並非改革開放前中國區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各種廣義的政治分層意義，此為針對經濟自由化後，因消費水平與消費型態不同所導致的社會分層，這些因消費文化不同而產生的群體是透過一種自我認同的方式區分自身的階級屬性，同時這種關於階級的定義是帶有強烈的模糊性，但同一階級通常具有相近的自我評價、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與心理特徵等特色。詳見王建平，**中國城市中間階層消費行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頁，27。

³⁵ 陳坤宏，前引書，頁 22。

³⁶ 姚建平，**消費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33。

性消費」或「炫耀財」(conspicuous goods, Veblen's goods)之概念。³⁷ Veblen 研究「有閒階級」(leisure class)如何透過炫耀性消費物質的方式，藉以突顯自身的不同。當購買商品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獲得直接的物質享受，更是冀望獲得心理上的滿足，並用以向他人投射、展露自身在消費上的浮華大方與排場等符號性的心態，³⁸ Veblen 對消費的看法是以競爭或炫耀性的方式看待，他認為，這種炫耀性的消費方式也是西方邁向物質世界的強大驅力。

此外，Bourdieu 則認為有一個結構在統轄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進行，他提出「生活方式空間」(the space of lifestyle)的概念，即「場域」，並透過此概念說明不同職業、不同社會地位的團體，其在擁有資本的數量與組成上亦有所不同。³⁹ 易言之，特定的品味、消費偏好、生活方式，均和特定職業或階級結構有一定的對應關係。⁴⁰ 另一方面，由此相對應的是，當個人「慣習」(意指各種資本的總合)決定了某一種特定生活方式，也便體現了個體所具有的品味，而這種品味則成為人們相互判斷的一個基礎。⁴¹ 並且，由資本、場域、慣習與實踐發展出的種種差異，更最終使階級區隔得已形成，這種情況更與 Baudrillard 所說的一句話相互映襯：「社會矛盾的解藥，不是平等化，而是區別分化。」⁴²

承上述，由於不同的場域形成相異的消費行為與品味，於是便誠如 Bourdieu 所言，區隔出現。⁴³ 周曉虹認為，該情況使那些居住在中國大陸城市裡，並在生活中水平、財產地位處於中等層次的社會群體—「中產階層」得以出現，而因中產階層在消費上所展現的前衛特質，也將致使他們出現與西方中產階級相似的

³⁷ 參見《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25 期，2002。參考網址：mail.nhu.edu.tw/-society/e-j/25/25-13.htm。

³⁸ 陳坤宏，前引書，頁 29。以及 Veblen, Thorstein 著、蔡受百譯，**有閒階級論**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30-38。

³⁹ Bourdieu 認為，資本雖由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所組成，但其總體是一種社會關係，是一種只在其被生產和再生產的領域中存在和影響的能量。見 Bourdieu, Pierr, Trans.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13.

⁴⁰ 許榮，**中國中間階層文化品味與地位惶恐**(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頁 122-124。

⁴¹ 參考 Bourdieu, Pierr, Trans. by Richard Nice, pp. 1-2.

⁴² Baudrillard, Jean 著，劉成富、全志綱譯，**消費社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90。

⁴³ Bourdieu 關於區隔的著名公式為：慣習+場域=實踐。即造成品味的區隔是由於個人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慣習)與消費場域(生活方式)而形成一種對於消費的實踐，此種時間最終會使得消費的行為作為一種社會分層的方式出現，並藉以區隔與自己不同的群體。

「消費前衛、政治後衛」之特徵。⁴⁴ 並且，這種政治後衛的情況是來自於中產階層的經濟利益與黨、國家的代理人之密切聯繫所決定。前述意指中國大陸一部分的中產階層：包含私營業主、國有企業的經理等，均與地方領導有著良好的個人或社會關係，經濟利益上的連帶關係便決定這部分的中產階層對現存政治或社會體制不會抱有希望變革的欲望。⁴⁵ 另一方面，目前在中國大陸愈趨壯大的「新中產階層」，他們直接受惠於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之果實，是一群為數不多而能接受菁英教育，並因此獲得良好教養、體面職業且收入較高的「白領」工作者。⁴⁶ 前述這群亦屬於新中產階層的白領，同大多數的中產一般，同樣有著政治後衛的態度，但不同於前述與國家、黨有經濟利益關係的幹部或私營業主，白領新中產階層具有抱持對社會穩定追求的需要，因為他們滿意自己的職業和收入，並且，他們也知道能透過現狀的維持而繼續逐步達到自身的更多需求。⁴⁷ 從周曉虹的研究可以發現，無論政治後衛的動因為何，中產階層群體對經濟或利益的追求使他們放棄自身的政治自主性，而不去質疑政治或社會的發展現狀，他們反對社會動亂而要求政治穩定，以繼續維持良好的收入與生活條件，正因為他們從切身利益出發，也因此，誠如周小虹所言，中國大陸的中產階層是「具有示範作用且能穩定社會力量」的意義群體。⁴⁸

類同於前述的觀點也表現在許榮的論述，他認為，由於居住在城市的中間(產)階層展現對經濟資本的熱烈追求，再加上中國大陸在威權體制之下，人民政治資本的先天缺乏，對於經濟資本的渴望與焦慮，自然投射到他們的感情與實際行為中。⁴⁹ 前述論點也藉李強研究階級是否平等與社會分層的角度得到證實。他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是以政治分層為主的社會，那時，人們經濟不平等程度較低，政治不平等程度高，甚至還存在嚴重的政治歧視。但在改革開放後，政

⁴⁴ 周曉虹，「中產階級，何以可能與何以可為」，*江蘇社會科學* (第6期，2002年)，頁37-46。

⁴⁵ 周曉虹主編，*中國中產階層調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5。

⁴⁶ 周曉虹，前引書，頁15。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參考周曉虹，前引書，頁15-20、頁303-305。

⁴⁹ 許榮，前引書，頁211。

治不平等程度大為下降，經濟不平等程度卻大幅上升，經濟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⁵⁰ 易言之，人們轉向追求經濟平等，而非政治。

處於消費主義的時代，人們消費時注重的不再是消費物品本身(使用價值)，而是針對物品的符號價值，符號價值代表消費者身分符號之突顯，藉以達成一種愉悅的想像感，此種想像感是透過購買商品(符號)的當下，透過符號所鍵結的社會地位而形成，這也是 Baudrillard 藉助馬克斯在資本論中談論的「商品拜物教(化)」情況，進而發展出符號消費的概念。⁵¹ 因此，消費最終可能形成一種擺脫自身真正所屬的團體(或階級)，而因此享有精神上的滿足與愉悅感，甚或是藉以持續維持自身已融入的團體之地位。

另一方面，Bourdieu 的論點有助於將中國大陸的城鄉地區進行區隔化的研究視角劃分，誠其所言，人們在日常消費中的文化實踐，足足表現和證明行動者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和等級。⁵² 由於文化符號領域和社會空間之間存在對應的關係，因此，在商品的昂貴與低廉、傳統與新潮、精緻與粗劣等各種購買關係的選擇之中，也一併投射了隱匿在背後的社會秩序與社會關係。此外，當城市展現「消費前衛、政治後衛」的情形時，農村在相對應之下，不如城市般具備高漲的消費主義與生活水平，因此，便可能出現當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趨於弱勢時，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政治資本的獲得，這也點出農村居民在公共事務的涉入上會比城市居民有著更多的動因。

(三)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論點 vs. 消費霸權下的自主參與意識麻痺

1、消費社會/大眾社會的批判

法蘭克福學派藉政治學的觀點研究消費社會，其將消費視為「霸權」(hegemony)的觀念加以思考。消費被認為是政治操控的工具，亦即統治階級運用消費此一手段來為其統治權力取得合法性的地位，這也可用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

⁵⁰ 李強，*轉型時期的社會分層結構*(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頁 37。

⁵¹ 參考 Baudrillard, Jean 著，劉成富、全志鋼譯，前引書，2001。

⁵² 姚建平，前引書，頁 30。

中，文化霸權對消費產生的作用力。文化霸權是指統治階級運用各種方式灌輸文化意識型態並加以宰制人民的思想，此觀點承襲自馬克思主義，即消費不過是某種社會與政治管理主義的形式，國家透過制定與政治不相干但卻關乎大眾生活的政策，來確保人們在政治上的百依百順，消費，也變成一種政治利用的手段與工具。⁵³ 易言之，消費社會的意識型態變成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共同信仰，並使二者的思想、需求趨於一致。

承上述，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藉商品的大量製造與消費，消除被壓迫者的抗爭意識，這便是文化霸權觀念在消費上的運用。⁵⁴ 諸如上述以誘使消費達到人民屈服於政府與放棄對抗的觀點，特別表現在 Adorno、Horkheimer、Lukacs、Gramsci 與 Marcuse 對消費/大眾社會的批判。⁵⁵ 而眾多學者之觀點，總的來說可以表現在 Shils 的一句話上：「一切都變得支離破碎的都市文化，生活在其間的人們彼此孤立、疏離，輕而易舉地便會受到極權政治家的荼毒與犧牲。」⁵⁶

在充斥大眾文化的消費社會，被原子化的個人受到「盲目之需要」所宰制，在這裡，盲目的需要表現在人們無可避免地無法自經濟與科技的規律中抽離，最終使個人自主性完全喪失。此外，由國家與上層精英所控制的文化工業生產體系產出大眾文化，塑造人們非出於自發性的產生消費「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於是，消費被異化，商品亦然。透過強制性的虛假意識支配力量控制並規範著消費者，同時也削弱了個體意識，⁵⁷ 並形成消費社會中的大眾文化藉商品「神話」後的控制過程。⁵⁸ 另一方面，也由於國家機器憑藉大舉介入資本的再生產過程，「襄助」經濟體系運轉，使累積(資本)與合法化(統治)均能共

⁵³ 參考 Slater, Don 著，林佑聖、葉欣怡譯。《消費文化與現代性》(台北：弘智文化，2003)。

⁵⁴ 陳坤宏，*消費文化理論*(台北：揚智文化，1995)，頁 75-80。

⁵⁵ 詳細內容請參考 Swingewood, Alan 著、馮建三譯，*大眾文化的神話*(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 1-31。

⁵⁶ Swingewood, Alan 著、馮建三譯，前引書，頁 25-26。

⁵⁷ 內容詳見 Adorno, Theodore W. & Max Horkheimer 著、渠敬東、曹衛東譯，*啟蒙辯證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7-152。

⁵⁸ 關於「神化」的觀點，乃參考 Roland Barthes 的立論。詳見 Barthes, Roland 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神化：大眾文化詮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存於社會，致使民眾對外界事務不再感興趣，其所從事的消遣娛樂與依附的價值觀全受到規格化之下的大量生產的意識形態所宰制。⁵⁹

2、單向度的思想與社會

「單向度」(One dimension)一詞為德國社會學家 Marcuse 所提出，他認為，單向度的人乃是喪失否定、批判與超越能力。這樣的人不僅不再有能力去追求，甚至也不再有能力想像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情境；此外，Marcuse 還指出，現代發達工業社會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是極權主義社會，而造成它極權主義性質的原因並非恐怖與暴力，而是技術的進步。⁶⁰

Marcuse 認為發達工業社會使批判面臨一種剝奪基礎的狀況。技術和進步擴展至整個統治和協調制度，創造出種種生活(和權力)形式，而這些生活形式似乎調和著反對這一制度的各種勢力。⁶¹ 按 Marcuse 的想法，當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傾向以技術導向為優先的社會價值存在時，人們將會被此種意識形態所箝制，並且，社會與個人思想都將臣服於該制度之下的生活模式，反對的聲浪逐漸隨技術的合理性統治與操控消失，多元思想併存的社會，也漸轉化為單一思想的單向度社會。此外，在單向度社會中，由於技術帶來的成就使社會制度形成更有效且更令人愉快的形式，而此種控制的極權主義傾向在另一種意義上維護自己：亦即把自己擴展到世界較不發達的地區，甚至是前工業化地區，並造成資本主義發展與共產主義發展之間的某些相似性。⁶²

針對此種以技術宰制的形式推論，當一個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組織方式而似乎越來越能滿足個人需要時，獨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對權的基本批判功能便會逐漸消失。⁶³ 也因此，政治上的反對被表達在某種維持現狀的範圍內，以討

⁵⁹ Swingewood, Alan 著、馮建三譯，前引書，頁 132。

⁶⁰ 參考 Marcuse, Herbert 著、劉繼譯，**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型態研究** (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⁶¹ Marcuse, Herbert 著，劉繼譯，前引書，頁 3。

⁶² Marcuse, Herbert 著，劉繼譯，前引書，頁 7。

⁶³ Marcuse, Herbert 著，劉繼譯，前引書，頁 14。

論和促進的方式選擇替代性的政策。此觀點不禁令人聯想到現今的中國大陸，廣大的社會問題被淹沒在各種經濟發展的話語當中，特別是在沿海先進的城市，是否會如同 Marcuse 所言，即國家的統治階級滲入大眾需求和滿足，而該滲入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厚，這也正好保證了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穩固。⁶⁴

另一方面，國家宰制的力量可最明顯地表現在地域的差別之上，城鄉的二元性便是其中的焦點。由於城市本身的發展特性，包括相對於農村的發達、媒體集中、資訊傳播更為迅速等，使消費主義在此間不斷得到強化與擴張，⁶⁵ 所以，城市所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相對於農村來得更多也更廣。而單向度的思想與社會也較大幅度地反映在城市而非農村當中。

二、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參與、實踐及公共事務參與之情形

中國大陸選舉制度的改革首先由農村開始，再推進至城市社區中展開，至今已有多年的積累，儘管中國大陸選舉制度的進程相較於經濟開放晚了許多，而選舉的程序和制度也離國際所公認的民主參與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但從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大陸所推進的基層民主無疑是對民眾選舉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回應，且不說因選舉而叢生的許多程序、制度上的缺陷仍待解決，更重要是，對中國大陸而言，基層選舉是以社會主義民主的方式加以推行、改革的目標。

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開展，主要是由於經濟發展帶來了基層自治之需要。在農村，第一個村委會的出現便是為了滿足公共管理的需要而生，⁶⁶ 以取代日益瓦解的生產隊組織。中國大陸政府也在 1982 年正式確認村委會的地位，再隨著 1988 年 6 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試行，村委會便在政府的履行、推廣並

⁶⁴ Herpin, Nicolas 著，孫沛東譯，*消費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75。

⁶⁵ 成伯清，*走出現代性：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的重新定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45-148。

⁶⁶ 中國第一個村委會誕生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縣屏南公社合寨大隊（現為宜州南鄉合寨村委會）作為自然村，於 1980 年 2 月組建。參考李凡主編，*中國選舉制度改革*（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頁 4。

激勵參與下，推進村自治與村委會的選舉。⁶⁷ 但是，村委會在組織法當中被定位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依此規定，村委會並非基層的權力機關，亦非基層的行政機關，只是群眾性協助基層政府機關行使公權力的團體。⁶⁸ 因此，從現實面來看，村自治的最大意義主要有二：一是穩定社會，二是保證黨的領導。⁶⁹

另外，城市社區則是從 1998 年開始進行選舉改革，在此之前，城市地區是由區政府領導下的派出機構—「街道辦」作為主要的管理單位。而在街道辦之下成立居委會，使居委會實際上成為城市最基層的政治和社會組織，並負責管理居民。但是，自 1998 年開始，中國大陸城市的基層社會組織發生了一系列變革，該變革醞釀了很長一段時間，既是由政府主導所推動，也是由社會經濟變化所引發的社會變遷所致。其中，城市除受到農村基層民主實踐的影響外，中國大陸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也為城市基層組織結構帶來重大變化。也因此，城市基層實行居民自治透過 1982 年憲法關於居委會的規定形式下開展，進而在全國人大 1989 年底通過並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下，於 1990 年正式開始實施。⁷⁰ 按前述，中國大陸基層民主的發展進程，主要是受到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變化所影響，其中，由於基層的舊組織單位、制度的不敷使用且不合時宜，更使得基層民主成為一種實際的需要。

第二節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及其轉換

與中國文化中漫長的封建制度相對應，集體主義的核心內容是宗法制，而宗法集體主義也稱為封建宗法集體主義，它並與封建宗法制度息息相關。封建社會以血緣關係為紐帶，與國家制度相配合，以維護家長、族長或貴族世襲統治的特權行為，而形成等級森嚴的宗法制度。⁷¹ 而自秦漢建立中央制度後，便出現了

⁶⁷ 李凡主編，前引書，頁 4-6。

⁶⁸ 楊開煌，「中國基層民主發展」，載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中國研究導論（上輯）**（台北：陸委會，2007），頁 395。

⁶⁹ 楊開煌，前引文，頁 399。

⁷⁰ 李凡主編，前引書，頁 26-28。

⁷¹ 劉榮榮，「集體與集體主義辨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第 12 卷，第 2 期（2008 年 4 月），頁 52。

君主集權主義，其是在維護君權統治為前提的宗法制度下，君主透過以血緣為紐帶的形式，對其同姓的族式進行權力的分配，並且，在擴展至對異姓族式下放地方權力。然而，這些被分封領地的諸侯，其權力僅限於食邑，而不能統治。⁷² 在此間生活的人民，其個人利益是以服從家庭、家族利益為先，再擴展至宗族、國家等較大面向的整體利益。

君主集權主義與宗法集體主義乃一體兩面，在君主集權的前提下，家長式的統治是根深蒂固的價值信仰，圍繞大大小小的家長式人物，使社會形成複雜的權力網絡關係；家長凌駕於集體之上，其他的個人則附庸於集體。因此，以家長制為特徵的宗法制，便成為抑制個人主義發展的主要原因。也因此，在中國並不存在形成個人權利意識的動因，而個體生命的價值是透過倫理政治得以實現，⁷³ 特別是在那些尊崇儒家為道統的歷代王朝中，更是將這種從血緣關係衍伸至君臣、父子、師徒等多面向的倫理、道德價值體系，並擴散至整個社會當中。最後，也奠定了以宗法為體的中國集體主義政治思想觀。

另一方面，在中國共產黨建政後，透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概念，將勞動與生產階級等新價值主體，融入以聯合集體推翻資本主義的想法，至此，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作了有機的結合。此外，以毛澤東為首的民眾大聯合思想，儘管其欲打破以宗法關係為社會基礎的傳統，⁷⁴ 但在大聯合的概念中，集體的革命與傳統中國的集體主義二種文化卻也形成了特殊的新型人際價值觀，小我與大我之間，更在共黨高層帶領的民主解放事業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結合。

於是，在 1949 年後的中國大陸，透過黨和國家高層的領導下，便使社會主義觀念形成人民政治思想價值觀的圭臬，並藉倡導、強調和灌輸大眾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外，還須崇尚權威和國家，進而反對突出個人表現或強調個人利益。⁷⁵ 這種以政治社會化的方式達成民眾對意識型態的絕

⁷² 徐大同，「中西兩種不同的政治思想體系」，*政治學研究*(第 3 期，2004 年)，頁 26-27。

⁷³ 劉榮榮，前引文，頁 53。

⁷⁴ 汪樹白、張慎桓，*毛澤東早期哲學思想探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頁 136-137。

⁷⁵ 池升榮，「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東西方社會文化差異理解的關鍵」，*太原師範學院學報*，第

對服膺，也致使社會主義集體思想便就此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集體價值相契合，並發展出屬於具中國特色的集體主義思潮。然而，與源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價值轉換，是從宗法制為主的集體主義向革命式的集體主義轉換、結合，⁷⁶ 在此種價值變動的過程中，卻因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面臨重大挑戰，以契約為概念的觀念逐漸形成，人的一切關係以個人作為起點，並與傳統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中的集體價值相悖。

承上，以契約制發展並相應而生的個人主義，衝擊了傳統中國的集體思想，即由儒家傳統所倡導的倫理觀，西方思想的流入使得以往融合血緣、宗法紐帶與社會主義大聯合的集體主義形成裂解。一般來說，個人主義強調以個人利益為先、重視利己與自由選擇的觀念；而集體主義則強調以家庭、宗族或黨、國家等道德倫理網絡為先，並且，家庭先於個人、國家先於家庭，使得注重家庭與注重整體國家利益為主的小集體觀念和服從國家相契合。⁷⁷ 然而，中國大陸的集體主義思想卻在改革開放後瀰漫個人主義的城市地區蕩然無存；相反地，中國大陸農村以農作為主的傳統集體特質，卻使集體主義思想仍有著持續存續的可能。

第三節 中國大陸城鄉人均收入與消費結構差異

一、中國大陸城鄉收入與生活方式

聯合國將恩格爾係數指數高低，作為評價貧富國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恩格爾係數 60%以上為絕對貧困型，50~60%為溫飽型，40~50%為小康型，30~40%為富裕型，30%以下為極富裕型。根據前述標準，從表 2-1 的恩格爾係數變化幅度來看，中國大陸城鎮與農村居民家庭雖均在恩格爾係數上呈現逐漸遞增的趨勢，但相對城鎮居民平均係數屬於富裕型而言，農村還落後在其後約十個百

7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32。

⁷⁶ 劉榮榮，前引文，頁 55。

⁷⁷ 張紅、劉斌，「中美價值觀教育比較：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對照」，*教育與管理*(2004 年 5 月)，頁 95。

分點，顯示城鄉之生活水平差距仍是目前最重要的民生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從表 2-1 也可得知，中國大陸城鄉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自 2000 年起，即呈現城鎮為農村的二倍左右，直到 2006 年，該差距則已擴大至將近四倍之多，逐年收入差異除突顯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外，更代表兩區域截然不同的生存條件與生活情境。

表 2-1 中國大陸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與恩格爾係數

年 份	城鎮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 純收入		城鎮居民 家庭	農村居民 家庭
	絕對數 (元)	指數 (1978=100)	絕對數 (元)	指數 (1978=100)	恩格爾係數 (%)	恩格爾係數 (%)
2000	6280	383.7	2253.4	483.4	39.4	49.1
2001	6859.6	416.3	2366.4	503.7	38.2	47.7
2002	7702.8	472.1	2475.6	527.9	37.7	46.2
2003	8472.2	514.6	2622.2	550.6	37.1	45.6
2004	9421.6	554.2	2936.4	588	37.7	47.2
2005	10493	607.4	3254.9	624.5	36.7	45.5
2006	11759.5	670.7	3587	670.7	35.8	43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鑑 2007，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indexch.htm>。

二、中國大陸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與消費結構：以上海為例⁷⁸

在城市收入方面，由表 2-2 可以看出上海市居民從 2000 年至 2006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形。其中，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收入與表一的中國大陸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相比，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06 年為 20,668 元，中國大陸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則是 3,587 元，二者間的差距比約在 6:1，即上海城市居民在可

⁷⁸ 考慮到上海發展的歷史，以及在中國社會中至今保持的典型性，上海代表著中國沿海城市的發達與先進兩特徵，足以作為中國沿海城市的一個指標性都市。

支配收入的範圍內，是中國大陸總體農村居民的六倍之多。

表 2-2：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2006)

單位：元(人民幣)

年 份	人均可支配收入 ⁷⁹	工薪收入	經營淨收入	財產性收入	轉移性收入
2000	11,718	7,832	120	65	3,701
2001	12,883	7,975	119	39	4,750
2002	13,250	7,915	436	94	4,805
2003	14,867	10,097	377	130	4,263
2004	16,683	11,422	507	215	4,539
2005	18,645	12,409	798	292	5,146
2006	20,668	13,962	959	300	5,447

資料來源：上海統計網，上海統計年鑑 2007，

<http://www.stats-sh.gov.cn/2003shtj/tjnj/nj07.htm?dl=2007tjnj/C0914.htm>。

另一方面，城市與農村的收入之顯見差異亦可表現在與收入相稱的支出之上。在表 2-3 關於消費支出的細項可以發現，上海城市地區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內容中，從 2000 年到 2006 年間，食衣住行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節節上升，而城市居高不下的各種費用，也使得居民在生活上的消費支出均超過表二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在象徵大眾文化的教育文化娛樂與服務的綜合支出上，也是上海城市居民在僅次於食品的消費後的第二個重要消費支出項目。

⁷⁹ 居民可支配收入指一定時期內居民總收入中，扣除家庭經營費用支出、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交納稅金和上交承包金、公益性及轉移支付後的(包括養老、失業、合作醫療、保險基金及罰款等支付)可用於生活消費、生產投資和儲蓄的收入。它與純收入最大的區別是扣除了轉移性支付，加上實際得到的公益性及轉移性收入後的餘額。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淨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淨收入。

表 2-3 上海城市地區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

單位：元(人民幣)

年 份	生活消費 總支出	食 品	衣 著	家庭設備 用品及服務	醫療保健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 娛樂服務	居 住	雜項商品 和服務
2000	8,868	3,947	567	683	501	759	1,287	794	330
2001	9,336	4,056	577	579	558	958	1,422	796	390
2002	10,464	4,120	613	653	734	1,115	1,668	1,189	372
2003	11,040	4,102	751	792	603	1,259	1,834	1,280	419
2004	12,631	4,593	797	780	762	1,703	2,195	1,327	474
2005	13,773	4,940	940	800	797	1,984	2,273	1,412	627
2006	14,762	5,249	1,027	877	763	2,333	2,432	1,436	645

參考資料：上海統計網，上海統計年鑑 2007，<http://www.stats-sh.gov.cn/2003shtj/tjnj/nj07.htm?d1=2007tjnj/C0916.htm>。

三、中國大陸總體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

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相較於城市的水平落後許多，由於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居民的純收入低，也使得因貧富差距造成的消費差異使得城市與農村形成另一種以消費水平作為分層標準的階級關係；也因此，在中國大陸的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中，從表 2-4 的數據可以發現，農村居民的生活各項消費支出雖也呈現往上攀升的現象，但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在衣著、家庭設備用品與服務和文教娛樂用品與服務等三大項支出中，農村居民的支出約莫只占城市的十分之一，差異之大令人咋舌，若推論此間原因，除了收入差異為極大的條件因素外，還由於農村較缺乏消費空間的相關誘因，所以難與城市相提並論。

表 2-4 按收入五等份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 (2006 年)

項 目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中等收入戶	中高收入戶	高收入戶
生活消費總支出	1624.7	2039.1	2567.9	3230.4	5276.7
食品	805.3	979.8	1154.8	1367.8	1965.7
衣著	94.4	118.2	150.0	193.7	320.7
居住	237.2	296.4	406.6	517.9	1011.6
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	63.9	85.8	110.1	147.5	256.8
交通通訊	129.1	178.4	243.3	348.0	626.5
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	146.4	202.1	272.9	371.6	608.6
醫療保健	117.5	137.2	173.2	209.5	359.0
其他商品及服務	30.8	41.2	57.1	74.3	127.8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鑑 2007，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indexch.htm>。

從上述的四個表格得以發現，中國大陸城鄉人均收入與消費支出結構的巨大差異。此外，對比本文假說與表格所呈現的訊息，便可以推估，原生於上海城市地區的白領青年，因高感染消費主義的傾向，使其總體收入與消費支出結構內容必定更高於表格數據中的平均比例；但另一方面，那些從農村赴城市工作的白領青年，為甚麼未將高收入的薪資也投入高消費的支出？透過筆者的田野調查，本文將於第三章說明城市白領青年高感染消費主義後的消費態度、行為，以及該現象如合影響他們涉入公共事務涉入上的程度；接著，第四章則將說明農村白領青年在城市的低消費之傾向及其原因，並且探究該現象如何影響他們在公共事務涉入上的態度與行為。